

師母與賢契

——與張兆和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得知這一噩耗的當天，張兆和就送去了花籃，花籃兩旁的黑色緞帶上寫著：賢契曾祺安息，兆和率晚輩敬輓。花籃置放在汪曾祺家靈台的前面，這是靈堂中置放的唯一一個花籃。5月28日，北京八寶山公墓弔唁大廳舉行了汪曾祺遺體告別儀式，年近八旬的張兆和執意要去送曾祺最後一程，她不僅是前來參加告別汪曾祺的人群中最年長的一位，也是來得最早的一批人。張兆和手執一朵待放的玫瑰，眼含著淚水，兩位晚輩攙扶著她，在《天鵝》樂曲聲中一步一步緩緩挪行……作家顧村言看了當時拍攝的照片，十分感動，在〈清冷與小溫〉中寫下這樣一句話：“照片上的張兆和眼睛裏滿是淚水，浸滿了悲痛。”那天，張兆和對汪曾祺子女說：

“汪曾祺是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當晚，有一位記者電話採訪了張兆和，她歎惜道：“像他（汪曾祺）這樣下筆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沒有了。” 這兩句話，當時就在媒體上廣為傳播，而在此後評價汪曾祺的文章中，其引用率也極高；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大概是關於汪曾祺的評價中最具概括性和影響力的兩句話了。

張兆和曾給汪曾祺一封“很長的信”，這是他終生難忘的信，汪先生曾多次與別人說過，也在文章中再三提及。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一時找不到職業，生活困窘，情緒極壞，甚至有了自殺的念頭。汪曾祺說，從文先生得知後，立即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同時又叫三姐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信中說的三姐，即張兆和也，她在張家姐妹中是老三。這兩封信是老師、師母對他生命的挽救，讓他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對汪曾祺的一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使汪曾祺終生銘記，終生感恩！

1961年，汪曾祺又因右派問題下放到張家口農科所勞動，有時不免會消沉迷茫、心灰意懶。沈從文寫信鼓勵汪曾祺不要忘了寫作，他勸慰弟子說：“你至少還有兩個讀者，就是我這個老師和三姐，事實上還有（黃）永玉！三人為眾，也應當算是有了群眾！”汪曾祺一直保存著這封信，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遺失了，但信中重要的話，他記得清清楚楚，腦海中常常縈迴著信中

的這段貼心的激勵之言。

1961年，汪曾祺寫了小說〈羊舍一夜〉，便隨即給了沈從文和張兆和，並寄交《人民文學》編輯部。當時《人民文學》編輯部負責京津及華北地區初審的崔道怡看了，十分喜歡“這種純正優美、詩韻溫馨的小說。隨即提交複審”。其時張兆和也任職於《人民文學》，與崔道怡同事，她對崔道怡介紹說，曾祺是從文的學生，文筆很好，並建議請黃永玉為小說做插圖。當時，張兆和的話，無疑是有一定分量的，也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

從文先生八十壽辰，他自己不告訴人準確日期，汪曾祺去問，他則說已經過了。汪曾祺“只好寫了一首詩補為之壽”，曾祺隨後便寫信告訴林斤瀾：“他一家看了都很高興。”當然，這個“一家”，首先就是沈先生和師母！

對三姐給他的肯定和讚許，哪怕只是一言兩語，汪曾祺都是很在意的。有一次在沈先生家，他們師生倆聊起了從文先生的〈月下小景〉，汪曾祺說：“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裏”，這寫得很美，但是我還沒有見到一個作家寫到甲蟲的氣味！”這時，張兆和“因為我發現了這一點而很興奮，說：哎！甲蟲的氣味！”（汪曾祺〈與友人談沈從文——給一個中年作家的信〉）

至於張兆和對孩子、保姆的“抒情氣氛”，汪曾祺也有文字

流露了他對師母的“尊崇”。比如，“沈先生、沈師母和兒子、兒媳、孫女是和睦而平等的。”“有一陣，兒子、兒媳不在身邊，孫女跟著奶奶過。這位祖母對孫女全不像是一個祖母，倒像是一個大姐姐帶著最小的妹妹，對她的一切情緒都尊重。……去年春節，孫女要搞猜謎活動，祖母就幫著選擇、抄寫，在屋裏拉了幾條線繩，把謎語一條一條粘掛在線繩上。有客人來，不論是誰，都得受孫女的約束：猜中一條，發糖一塊。有一位爺爺，一條也沒猜著，就只好喝清茶。”沈先生請過一位保姆叫王嫂，和沈家一直相處極好。離開沈家多年，還一直和沈家來往。王嫂“去年在家裏和兒子慪了一點氣，到沈家來住了幾天，沈師母陪著她出出進進，像陪著一個老姐姐。”（汪曾祺〈我的老師沈從文〉）

因有刊物約汪曾祺寫關於沈從文轉業的文章，汪曾祺要夫人施松卿打電話給張兆和，張兆和很是支持，說“叫曾祺來一趟，我有話跟他說。”張兆和給了汪曾祺幾封沈從文的信，汪曾祺說，“看了這幾封信，我對沈先生轉業的前因後果，逐漸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

1992年10月24日，學者巨文教就沈從文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專程拜訪請教了張兆和。臨別前，巨文教告訴張兆和，明天將去拜訪汪曾祺。張兆和對他說：“到汪先生處，會有更多收穫。”這一句話，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張兆和對汪曾祺的信任與

讚許，並由此感悟到汪曾祺對從文先生的了解與理解已達到何等的廣度和深度。

沈從文先生去世後，汪曾祺協助張兆和參與了《沈從文全集》和《沈從文別集》的編輯出版工作，並應邀擔任這兩本大書的顧問。同時先後參加這兩本大書編輯工作的張永中先生還記得一個細節：在編輯《全集》期間，張兆和曾幾次請有關同志吃飯，“一次是專門去全聚德吃烤鴨。那天，汪曾祺先生也在，還喝了點酒，臉呈了醬紅，講話聲音有點嘶啞，卻洪亮。”（張永中〈杜鵑聲裏的記憶——關於沈從文墓的一些舊事〉）從文先生在世時，曾有個願望，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選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冊子，便於收藏攜帶，便於翻閱”，並基本選定了作品。他去世不久，嶽麓書社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迅速就編輯工作進行了溝通、磋商並達成共識。在為這套袖珍本定書名時，汪曾祺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借汪朗的話說，這書名是老頭兒“捫摸”出來的。開始，這套書名擬叫《沈從文作品選》，大家認為太俗，不好。叫《沈從文作品精選》吧？感覺也是流於一般了。最後，汪曾祺建議為《沈從文別集》，張兆和與同事們都覺得好，一致欣然從之。

用學者邵元寶的話說，“汪曾祺對這位師母是非常崇敬的。”（邵元寶〈汪曾祺寫滬語〉）此言不虛也！這種崇敬，雖與老師沈